

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 第一辑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



胡显章 曹莉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

胡显章 曹莉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生活节奏全面加快的今天,回顾并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对于大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务处于2005年上学期联合推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本次系列讲座共请到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10位中国学者,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观念出发,围绕“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这一主题,结合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对大学及大学理念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本书正是这一系列讲座的结集,它的出版将为关注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独特的思想成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曹莉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302-13477-4

I. 大… II. ①胡… ②曹… III. ①高等学校—办学经验—世界—文集 ②高等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IV. G6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349 号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马庆洲

文稿编辑：王巧珍

印 装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5×210 印张: 9.625 字数: 215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13477-4/G · 726

印 数: 1 ~ 4000

定 价: 22.00 元

总 序

由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进的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已走过了十年的路程,各高校采取了多种形式与途径,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开展专题讲座便是一种有益的做法。继成功开设“中国与世界优秀文化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讲座”之后,清华大学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联合推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基本上一个学期一个专题系列讲座,每个系列讲座都出一个集子。

为什么称“新人文讲座”呢?主要有两层寓意:

第一,系统深入开展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已有十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认识上应当有新的提高、新的发展。

从一所大学来看,应当从大学的历史文化使命和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和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努力发挥好文化融合的功能。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断精细化,加上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对人们的普遍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野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分



离与论争,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1948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曾在清华大学作过“半个人的时代”的演讲,呼吁大学教育中的文理结合。1959年,英国具有作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的状态及其危险性。1963年,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一文中呼吁建设一种能沟通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关于两种文化和第三种文化的话题所引发的讨论延续至今,尽管一些教育工作者不断为沟通这两种文化作出过努力,斯诺所期望的局面始终未能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罗伯特·卢普瑞特在《四十年后:回顾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所指出的,尽管斯诺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如此惊人,以致将人文世界完全置于阴影之中,而且这一势头越来越强劲,越发使人文处于守势”,表现在管理工作以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上就是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因而“情形往斯诺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妨碍了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相互尊重、宽容与接近,影响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实际上,这种哲学观也影响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近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同等重要性,明确了以人为本,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的科学发展观,为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哲学基础和外部环境。作为最高文化殿堂的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文化融合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为科技创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才能肩负起引领先进文化前进的历史使



命。为此,大学面临着重大的文化自觉的任务,这也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师生的文化素养,包括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和良好的为人治学做事的态度,最终使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得到提高,并由此影响整个社会。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进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第二,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在实施的方法内容上应当有新的探索、新的开拓。目前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正在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开展大学文化的研究,以期为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为提升大学的文化自觉和推动大学文化建设做一些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组织编写“清华新人文丛书”,这套丛书的立意体现了我们对于未来大学文化的基本思考与判断,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探讨与体现。本丛书分为三个系列:(1)科学与人文的会通;(2)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对话;(3)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不难看出,这里的所谓“新人文”是一种能够与科学文化和不同文化对话、渗透、会通的人文文化,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广义的“第三种文化”。

第三件事情是协助学校教务处逐步完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与课程建设,在强化人文教育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文化的会通。

第四件事情便是与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联手组织“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这个讲座从探讨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出发,以推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沟



通与融合为主要宗旨。

文化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受教育者自己的事情。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提到：“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难题当然要依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改革，但是，对于学习的主体来说，那只是外部条件，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我们期望每个“受教育者”能够高瞻远瞩，主动利用学校以至社会提供的各种学习条件，进行有效的自我教育。我们希望这个“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演讲集能使你们“开卷有益”。

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

胡显章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

2006年春节于清华园

未完成的演讲

（代序）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并非一个新的话题。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治国”到纽曼倡导的“博雅教育”，从中国《易经》中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早已是几近与大学同龄的古老话题。而关于此话题的公开讨论，在上两个世纪的很多世界名校中早有发生。其中，剑桥的瑞德演讲(the Rede Lecture)就曾为几代宗师提供了争鸣和论辩的讲坛，比较著名的是阿诺德针对赫胥黎 1880 年在英国伯明翰梅森理学院的成立典礼上所作的“科学与文化”的演讲，于 1882 年在剑桥以“文学与科学”为题所作的回应，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 C. P. 斯诺有感于以英国为首的现代西方大学中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绝，在同一个讲坛上所作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这两次演讲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主题都是围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孰重孰轻，文理如何兼容并蓄、“全人”如何培养等有关大学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在当代中国，自世纪之交起，国内一些名校如清华、北大等期望在本世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以来，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阶层关心国家教育事业的人们对于中国大学理念和



大学目的的讨论与思考可谓层出不穷,方兴未艾,它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也激起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层层反思。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节奏全面加快、诱惑和选择纠缠不清的今天,回顾并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探讨并追求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共赢,对于大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现实,并为纪念清华大学和全国其他高校正式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清华大学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团委于2005年2月至6月联合推出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一)——“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期望以此促使广大同学青年暂停一下匆匆的脚步,和主讲人一起来共同思考和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

本次系列讲座共请到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10位中国学者,他们从不同的学识背景、观察和思想视野出发,围绕“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这一主题,结合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对大学及大学理念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表了独到精辟的看法和见解,在清华校园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受到社会有关方面和媒体的关注。应该说,在今日清华这样一个工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大学讨论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在比较清华和北大时,常常会说北大人往往坐而论道,清华人则“行胜于言”,就像有人说起牛津、剑桥时会说“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教你有中之无(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一样,乍一听,似乎人们是在批评北大的夸夸其谈,称许清华的埋头苦干。然而认真想



来,真理不光需要实践——所谓实践出真知;真理还需要言说和书写,需要启蒙与呐喊——所谓道理越辩越明。

当专业化教育仍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将学生赶往图书馆和实验室,当专业成才在一般的大众社会意识中仍然高于精神成人,当就职和“成功”的压力日胜一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课外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必需和迫切。通过开展如名师讲座、名人访谈、经典带读和艺术欣赏等多样性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外活动,有可能帮助同学通过与名师、名作、名篇及由之带来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均衡协调的发展,并不断在生动活泼的交流和实践中学会发现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真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正是试图为广大同学青年提供一个“与名师同行,与真理同在”的想象空间。系列讲座的总标题之所以突出一个“新”字,是想引导同学们在当下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和考察以人为本、人文日新、科学精神、人文底蕴等一系列既古老又新鲜的理念与思想,并在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中,对固有观念、陈规陋习进行“冲泡和松动”(阿诺德语),成为不光知道埋头拉车,还知道抬头看路的高素质的人。当同学们满怀好奇和疑惑追随先学的思路,分享其学术洞见和精神追求时,与名师的对话便自然而然地在心中生成;当学子们一边凝听名师的教诲,一边在知识的殿堂里数经问典、踽踽独行时,辨析是非、追求真理的能力和品格便悄然而生。曾经有位同学在听完一次讲座之后发来这样的邮件——“讲座刚听完就急忙跑到图书馆,东施效颦地一定要借一套《西方文明史》,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失去的补回来,结果只有一套,还被人捷足先登了。”还有一位同学写道:“在许多日子里,焦急地等待讲座那天的来临几乎构成了我对学习生活大部分的期待和向往。”一场讲座能



促使同学找出自身的差距并激发起对知识的真正热情,一个系列能让同学有如此热切的期盼并产生仰望星空的冲动,仅这些,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开始。

“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的正式开讲是在2005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作首场演讲。杨先生是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理想诗情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任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期间,他以一位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特有的眼光和睿智带领全校师生在校园里刮起了一股“人文风暴”,为全国其他的高校,特别是以理工为主的高等院校树立了推广以人文素质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榜样。2005年4月初,古老的京城和往年一样,在绚烂的榆叶梅悄然绽放的时节,走进了又一个春风暖人的人间四月天,“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即将拉开帷幕。其时正逢杨叔子先生来京开会,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胡显章教授邀他作讲座的第一讲,杨院士欣然答应。4月6日傍晚,杨先生面带大学者特有的虚怀若谷的微笑,如约来到清华。演讲前顾秉林校长邀他共进晚餐。席间,他谦虚恳切地对顾校长说,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得早,做得好,没有清华、北大的积极参与,全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当晚七时二十五分,杨先生在胡显章教授的陪同下准时来到演讲现场——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此时的报告厅早已被热情的听众围了个水泄不通。顾校长当晚学校有会,特请夫人吴亚茹教授到场,但由于听众太多,吴老师赶到后与很多教授、学生一起被堵在了门外。当晚的讲座由胡显章教授主持,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年逾古稀的杨先生一直精神饱满地以站立姿势,用略带江西湖口口音的普通话,以“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为题,引经据典、诗情画意地以



时代精神为参照,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传统作了热情洋溢、振奋人心的阐释,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动容。出席演讲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盛赞杨先生的演讲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文化大餐”。

第二场演讲是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学术相声”: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刘兵和江晓原是常年的学术搭档,二位虽说风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研究兴趣,长期以来他们专治科学史的研究,又都是口才极好的作家型学者,曾在多种场合联袂上演过“学术相声”(江晓原语)的好戏,受到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他们思维敏捷、谈吐风趣,演讲极富表现力。经常阅读《文汇报》、《科学时报》、《东方早报》、《文景》等京沪两地报纸杂志的朋友们会发现,二位学者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很有建树之外,还非常关注中国大学的现状和未来,经常撰文或演讲,为传播科学文化、提高学术品位奔走呼号。4月13日晚,刘兵、江晓原围绕“两种文化”与学术品位在图书馆报告厅以对话的方式给听众讲演了一场既严肃又诙谐的学术相声。他俩直言疾呼谨防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伪创新和伪出版,反对计划学术、量化考核等急功近利的唯科学主义的学术研究和评估机制,提倡两种文化——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平衡和交融。刘兵声音洪亮,谈锋甚利,像个黑脸关公;江晓原则脸色红润,面带微笑,活佛一般端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两人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紧一个慢,配合极为默契,给在场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次日清华新闻网以“‘南腔北调’话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为题作了及时的报道。

系列讲座还赶巧请到了台湾东吴大学谢东闵人文社会科学讲座教授袁鹤翔先生。袁先生曾是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的系主任和香港比较文学学会创始会长。袁先生曾在20世纪90



年代初应原外语系系主任吴古华教授的邀请来清华讲学,那时我还是一个刚走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印象最深的是袁先生从文艺复兴的绘画谈起,告诉同学们怎样用透视的、多维度的眼光去看文学、看世界。袁先生温文尔雅,学贯中西,中英文都极其到位,令人仰羡。他讲课深入浅出,给人一种被智者引领前行的感觉。4月中旬他应外语系的邀请再次来清华讲学,当我请他借此机会在图书馆报告厅讲一讲他所认识的大学理念的时候,袁先生欣然应允。4月20日晚,在座无虚席的报告厅里,袁先生如数家珍,旁征博引,用他那特有的中英文灵活并用、清晰晓畅的语言将中西大学理念的嬗变和发展一路娓娓道来,带着学子们饱览了大学理念古往今来的一道道特色风景。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并长期在美国和香港工作的经历给了他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中西两种文化的底蕴。他在演讲中提到的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T.S. 艾略特等人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在下一讲韩敏中教授的演讲中得到了不约而同的回应。袁先生还利用这次来清华讲学的机会,对清华大学的人文教育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令人难忘。

北京大学英文系的韩敏中教授是这次讲座系列的10位演讲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近年来,她潜心从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的研究。2002年,她翻译了英国文化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著作——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并发表了《阿诺德、蔡元培与“文化”包袱》的长篇论文,着重讨论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反思等当今中国知识界需要充分思考而似乎还顾不上充分思考的问题。4月27日晚,韩教授如约从北大清华蓝旗营教工寓所骑着单车来到图书馆报告厅。她演讲的题目是“Float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 阿诺德的‘文化’与反思意识”。韩教授在解释标题中阿诺德的这句英文引言时说:“[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对我们既定的、固有的、已然在那里很久的观念和习惯进行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指对知识的“有用”和“无用”标准的反思、对“知识就是力量”、“社会进步”、“科学主义”、“德先生”和“赛先生”等貌似毫无问题的思想和概念的反思。她就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观点和意见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不免感到吃惊和新奇,也许从没有想过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响亮口号和宏大概念可能会有问题,需要对其进行“冲泡和松动”。其实,韩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其他几位的演讲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甘阳先生的演讲干脆就以“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为题,重新阐述了他在《将错就错》里所说的“有‘大学之恋’的人不是把大学单纯当作谋生之所,也不是把大学作为从政经商的跳板,而是视大学为神圣殿堂,甚至对大学有某种近乎宗教感情的人”。

第五讲的演讲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陈先生的主要学术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他还兼治学术史和教育史,先后出版了《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等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媒体也因此称陈平原先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实际上,在这方面,其他的几位演讲人都有与陈先生相同的意向和兴趣,即对中国教育的深切关心和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从不同的学术背景,甚至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先后走向“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讲坛。这次陈先生是应原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的邀请加盟“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学里值得回味的故事,以及



故事背后的一种精神。他的演讲即从考证“清华国学院”的名称及其由来开始，讲述了当年国学院里大师与弟子的故事，以期今天有可能传承“清华薪火”的清华学子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清华精神(传统)”的历史渊源。

龚育之先生是清华的老校友、老学长，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现在是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龚育之先生是著名理论家、自然辩证法和党史研究专家，曾参加过《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党史文件的编辑和起草工作。6月9日下午，应胡显章教授的邀请，76岁高龄的龚老如约来到清华作题为“科学与人文：双赢和交融”的演讲。龚老从作家王蒙的哲理小说《线索》讲起，引出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话题。他结合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和随后发生的“科玄论战”，对“反科学主义”的一些盲目论断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提醒学术界应慎言“反科学主义”，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社会运用的负面后果，关注受自然科学影响而日益成为科学的社会学科，历史地看待重理轻文现象，科学区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他提倡以科学态度对待“反科学主义”。最后，他深情地呼吁，应提倡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当演讲结束，主持人胡显章教授对龚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向龚老不畏年迈劳顿而传播学术、探索真理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

本系列讲座第七讲的演讲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汪先生本世纪初转来清华，从登上讲台的第一课起，就受到同学们的仰慕和欢迎。汪先生是中国思想史和鲁迅研究专家。当然，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从1996年起出任



《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不言而喻,几十年来,《读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常翻阅《读书》的人都会发现,近几年,《读书》曾组织过多次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息息相关的“专题讨论”。2002年10月,《读书》编辑部与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就共同举办了“寻求为生活的文学”的专题讨论,探讨中国大中小学的语文(文学)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见《读书》2003年第一期)。正是由于阅读这期讨论时的感受仍留存于心,我就越发萌生了请汪晖教授向全校作一次演讲的想法。于是,由徐葆耕教授出面邀请,汪晖教授决定在6月16日下午讲一讲“高等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主持人徐葆耕教授在开场白中以他一贯的融诗意与思辨为一炉的语言将高等研究比喻为“皇冠上的明珠”。他说:“杨振宁先生来清华后,有感于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同自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相关,在清华办了一个高等研究中心……如果我们说,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上的皇冠的话,高等研究中心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清华的研究中心到现在为止还只有自然科学。也就是说这颗明珠只有一半,今天,汪晖教授就是要谈明珠的另一半,即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研究问题。”汪晖教授在演讲中结合自己在柏林高等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高等研究机构访问和工作的经历,说明高等研究是为第一流的学者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不同领域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并强调它的首要目的可能不是“解决现实实践课题”,而是通过不同领域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生产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将促进学术思想的创新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与进步。这一观点明显地暗合了韩敏中在演讲中对知识“有用”和“无用”的标准的反思。但愿高等研究这项“皇冠上的明珠”能早日以更加完美的形式和内涵在清



华诞生，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和研究型再添新的光彩。

从6月中旬开始，清华和往年一样，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但6月22日下午图书馆报告厅还是挤满了听众。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的甘阳先生正在这里作“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的演讲。^①甘阳先前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并因主编大型文化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而为海内外瞩目。记得当年读甘阳在《读书》上的文章和后来的《将错就错》，我就对他的平实流畅且富有穿透力的文字印象深刻。5月12日晚，甘先生曾在我校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第四讲上发表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反响热烈。6月18~20日，他作为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的执行主席在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圆桌会议，在发言中他提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着七个问题，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极大兴趣与关注。此次由汪晖先生引荐加盟新人文讲座。22日下午的报告由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清华学报（哲社版）主编罗钢教授主持。罗钢教授在介绍甘阳时称他是思想型的学者，思想很有穿透力。果不其然，甘阳在演讲中精当晓畅地阐述了“大学之道”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指出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面临的二者的博弈集中表现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处理上。他以美国为例，着重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美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改革和进步，主张历史地、辩证地考察美国教育特别是大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它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追求那些时尚的、肤浅的、与中国

① 演讲原来的标题是：《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在整理出版时，演讲者本人对演讲稿进行了修订增补，并将标题改为《大学之道与文化自觉》——编者注。